

山雨欲來風滿城

——徐永昌將軍的傳奇之六

喬家才

簽字用筆呈獻政府

徐永昌代表中華民國在東京灣美國軍艦米蘇里號上受降，先由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的重光葵在日本降書上簽字，繼由代表日本大本營的梅津美治郎簽字，然後麥克阿瑟元帥簽字，再次由美國尼米茲元帥、中國徐永昌上將、英國符立則上將、蘇俄狄弗揚科少將、澳洲卜來梅上將、加拿大考斯古特上校、法國納克勒克少將、荷蘭海烈夫科須海軍中將、紐西蘭立錫惕少將代表九國簽字。我國參加簽字典禮的有楊宣誠、朱世明、王丕成、李樹正、陳延輝。此項簽字的日本降書，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華盛頓寄到重慶，永昌立刻呈送蔣委員長。他所用的簽字鋼筆，刻以「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東京灣簽字日本降書之筆」，裝入「萬邦咸寧」匣內，呈獻國民政府。簽字完畢，記者要他說幾句話，他考慮以後說：「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，今天每一個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的回想一下過去。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，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。」

徐永昌所說的過錯，究竟是那些過錯？懺悔些甚麼？一直到五年以後，民國三十九年九三軍人節，他才有較詳細的說明。

誰該認錯懺悔什麼

日本侵略中國，從清同治末年即已開始，在這七十多年漫長的歲月中，不能振作自強，作保衛國家的措施，我們中國人能不慚愧，能不懺悔嗎？九一八日本以武力搶佔我東北，國際聯盟毫不起作用，主持國聯的強國不能對侵略者作有效的制裁，反而予以不應當的遷就。日本侵略一試得逞，其他侵略者起而效尤，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，希特勒併奧併捷克，國際聯盟列強不應該懺悔嗎？蘇俄係極左的共產主義國家，希特勒係極右的納粹國家，本來冰炭不能相容，為要瓜分波蘭，居然簽定德蘇協定，希特勒才能發動大戰，如果不是美國投入戰爭，開闢歐洲第二戰場，蘇俄早被德日瓜分了，蘇俄能不懺悔嗎？英美和史達林簽訂雅爾達協定，出賣了中國，蘇俄進佔我東北，中國陷入困境，終於使大陸關入鐵幕，英美不應該懺悔嗎？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並沒有帶來和平，給人類帶來幸福。打倒希特勒獨裁，造成共產黨主義的擴張，東歐成了共產帝國的附庸，中國、韓國、德國分裂為二，中南半島整個赤化，民主國家能不懺悔嗎？當各國的受降代表都以勝利者的姿態簽字時，惟獨徐永昌憂心忡忡，知道大戰結

病魔纏身無暇就醫

東，並沒有勝利，並沒有和平，而要大家懺悔。我想，當麥克阿瑟領導韓戰，在杜魯門不求勝利，將他免職，他一定也會懺悔，可是為時已晚。

八年抗戰，徐永昌主持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，使參謀作業統一，增強抗戰力量。實際上，他是帶病工作，帶病抗戰。他所以自慰的，他所主持的業務，十九如他所料，終於獲得最後勝利。他第一次吐血，遠在清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，祇有二十二歲，為武衛左軍騎衛士，駐東北呼蘭府。他以為是過年喝酒酒醉所致，毫不在意。這一年他考入隨營學堂，一開始功課跟不上，成績落後，乃發奮補習，力求上進，終於獲得全班第一名。因為用功過度，第二年（一九〇九）又吐血了。實際已感染肺結核，而不自知。

民國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戰爭，馮玉祥、孫岳首都革命成功，孫岳的部隊改為國民三軍，孫岳的身體不好，國民三軍實際上由他代替孫岳主持，成了國民三軍的實際領導人物，工作煩忙，又增加了胃病。

十九年中原大戰，徐永昌是閻、馮方面隴海路總指揮，在黃河以南指揮作戰。閻馮戰敗，他統率晉軍退過黃河，登太行山，返回山西，咳嗽

發作，經檢查係肺結核，當時尚無特效藥，病情日益嚴重，二十二年入協和醫院。他身為山西省政府主席，又兼北平軍分會和政治分會委員；在日本軍閥加緊侵略，要華北特殊化的情況之下，他能安心待在醫院嗎？所以未經醫生許可，離開醫院，返回太原。

二十四年肺病和胃病同時發作，實在支持不下去了，再到北平入協和醫院。一位英國醫生詳細看過病歷以後，問他：「你來幹甚麼？」

徐永昌說：「看病。」

醫生又問：「前年你來幹甚麼？」徐永昌語塞，沒有回答。醫生說：「當然也是來看病。前年檢查有肺病，非治療不可，為甚麼不療養就走了？今病加重，診治何益。醫生很忙，不願意診治能治而不治的病人。」

受了醫生的責備，這才安心住院，作全身檢查，肺病已過初期，再不休息，就不得了。可是華北的軍政要員為商討對付日本侵略，來訪者接踵而至，仍然不得靜養。二十五年夏辭去山西省政府主席，算是擺脫政務。不到半年，到這一年年底，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，又落到他的肩膀上，推辭不掉；接着抗戰，任軍令部長，責任更為繁重。參贊決策，運籌部署，胃病肺病交相發作，不時吐血。

三十一年徐永昌病情加劇，九月請假赴成都休養，十月十七日返回重慶的早上，獨自在小陽臺上，忽見門口飄來一紙片，上書「徐天語人壽」，他很奇怪這一片來路不明，語意含糊的紙條。說也奇怪，以後病情照舊，居然能撐持着工作

，一直到抗戰勝利。他引以自慰的，處理的問題，十九如他所料。

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裁撤軍委會，他以為可以專心養病了，不料六月十九日國民政府又特任他為陸軍大學校長，懇辭不獲；七月十七日飛往重慶視事。八月中又犯吐血，九月飛上海就醫療養。陸大校長要比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和軍令部長輕鬆的多，他雖辭不掉，對於養病尚無多大妨礙。不幸對日抗戰勝利了，內戰擴大，共產黨在北方，在東北漸佔優勢，戡亂陷入困境。總統對徐永昌非常倚重，使他席不暇暖，奔波於華北各戰場。

三十七年太原包圍圈縮小，情況緊張，七月十一日徐永昌奉總統命，飛太原視察，慰勞守軍。十五日由太原飛北平，晤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和副總統李宗仁。十九日返回南京，向總統報告視察經過。二十二日隨總統再飛太原，當日返京。九月三十日隨總統飛北平，濟南已於二十六日失守。總統於十月二日飛瀋陽，次日返北平。五日隨總統飛天津，至塘沽乘重慶號巡洋艦赴葫蘆島。七日返回北平。當時東北情況惡化，士無鬥志，總統問他甚麼原因，他直率回答：「在上者經商，其次吃空額，其下離心離德，如此軍隊，何能言戰。」

八日總統告訴他，太原又吃緊，囑他前往視察，下午總統飛上海。他於九日飛太原，十日飛返南京，向總統報告太原情況。

十九日總統飛瀋陽視察後，回駐北平，電召徐永昌赴平，二十三日與行政院長翁文灝同機飛

平。二十七日隨總統飛熱河，三十日飛回南京，錦州已於十六日，長春已於十九日相繼失守。十一月二日瀋陽失守，他感慨地說：「三四十萬大軍，不到三週，變潰淨盡，皆由於營私無鬥志，不講求紀律。」

三日傅作義到南京，總統約徐永昌陪傅晚餐，並商討軍事，總統允許傅再成立六個師。

五日傅作義對他說：「可惜時間太晚！」

徐永昌說：「當秉愛國家，愛人民之心為之。無所謂早晚。蔣先生將華北交給你，平津非不得已，不能放棄。」六日傅飛返北平。

「林彪出平綏路東段，康莊鐵路已斷。」十一月十二日總統告訴徐永昌：「張家口兩個軍已被包圍，平津吃緊，宜生很著急，你明天去一趟北平。」十三日飛北平前，先督謁總統，總統對傅作義指示三點：(一)北平有二百萬人，若被圍，決難持久。所以祇可留一後衛，其餘集結津沽，守戰皆易。(二)切囑宜生，勿太焦急，革命不一定要在某一地點，勿以社會感情，當前毀譽，患得患失而左右，應當決定大計。(三)準備失敗不敗。徐永昌坐機下午一時降落南苑機場，殊出意外。機場無車，駐平空軍司令謂敵距機場祇有二十里，基地人員即飛青島。他告以必須接通傅總司令的電話，接通電話，將總統三點指示告知。傅總司令說：「敵已準備分段截擊平津線，已無法轉移。且新保安等處被圍部隊，也不能棄絕不管。」

徐永昌說：「我大軍若由北平突出，轉往津沽活地。各地被圍之軍心，必然振奮突圍，津沽

亦可派兵援救。否則由小圈中突入大圈，其勢不能振作。」

「我們津沽一帶尚有八十七軍、六十二軍、九十五師、九十二軍，我可以考慮考慮。」

徐永昌問能否見面一談，傳說他就來。永昌心想，如傳來，商與他先偕赴津，則不決自決矣。突然又傳有情況，機場紊亂，都奔上飛機，他也祇好登上來時飛機，上機後，向機場詢問，傳總司令到了沒有，機場回答，傳總司令已到機場候談，他遂令座機降落，僅有電話兵守候，說傳總司令已去，機場則很平靜。他想，如路上不靖，傳又怎能來到機場，既來又為何即去，百思不解，祇好起飛返京。

穿梭六省宣達機宜

徐永昌返京後，又將機場所說，用電報告知傅作義，傳復電：林彪入關，分路逼近近平津線，聶榮臻由綏遠襲張家口，我軍轉移津沽，殊不可能，決固守平津。他非常歎息傳作義捨不得離開平津，祇有據平津以待斃。

三十七年十二月行政院改組，總統要徐永昌任國防部長，他以身體不支，力辭不獲。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。二十一日永昌飛北平，轉達總統對傅作義的三點指示，下午九時許飛返南京，總統已於下午四時宣布引退，飛往杭州。不久傳作義在北平局勢和平，投降共產黨，共軍於三十一日進入北平。

三月八日行政院長孫科辭職，二十三日何應欽就任行政院長，仍以徐永昌為國防部長，准他

到五月底辭職。次日派邵力子、張治中、黃紹竑、章士釗、李蒸為代表，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、林柏渠、林彪、葉劍英、李維漢進行和談，共軍則繼續南下。四月二十三日國軍撤出南京，李代總統飛往桂林，二十四日太原城破，省政府代主席梁敦厚以下五百人殉難。總統蔣介石引退後，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協助政府，四月二十六日會晤各將領於吳淞太康艦，會後留徐永昌與顧祝同研究當前情況，即赴廣州；五月八日李宗仁也到。十五日武漢撤退，二十七日上海撤退。何應欽辭行政院長，六月三日閻錫山就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。

十八日徐永昌在高雄晉謁總裁，詢以最近情況，徐永昌說：「看不出共產黨有不如過去的，而我們幾個月來，十之八九在對內，似此，尙何轉機之可言。」

七月十四日蔣總裁飛往廣州，研究國民黨改進方案。十八日閻院長告訴徐永昌：「昨晚代總統官邸會報，以胡宗南和馬步芳不能合作，致有關中之敗，決定成立『西北指揮所』，由你前往指揮胡馬。」徐永昌敬謝不敏。白崇禧也由武漢電李代總統，以徐永昌至漢中指揮胡馬，以挽危機，徐永昌以為設一參謀團前往即可。閻院長也促他出任，不但指揮兩個長官，也為保全綏遠八萬軍隊。他仍以參謀團前往為宜。

說話人多打仗人少

蔣、李都要他去視察雲南、四川、漢中、蘭州、綏遠、寧夏，二十四日由廣州起飛，下午抵

重慶，二十五日參加西南行政長官公署會議，長官張羣，副長官錢大鈞、孫震。二十六日飛昆明，會晤盧漢、龍澤澐、楊杰、關麟徵、余程萬等，開誠接談，停三日。二十九日飛蘭州，晤馬步芳、趙守鈺、張伯英、劉任等，馬步芳告以西北最大的毛病，就是說話的人多，打仗的人少。三十一日飛抵寧夏，馬鴻逵長子敦厚、次子敦靜（代主席）率各廳長迎接。八月一日飛抵陝壩，晤傅作義之將領董其武、孫蘭峯、劉萬春等，分別談話，苦口婆心，舌敝唇焦。董其武表示，必要時可退河西。他說：「河西是死地，不足有為，不可以退河西。」

八月二日飛漢中，經寧夏會稍停。抵漢中，胡宗南、董劍、李文等迎往中國銀行。曾坦誠地告訴胡等：「吾人若不覺悟過去的一切錯誤，痛加改悔，勢不至毀滅不止。」次日和胡等會談後，由漢中飛成都，晤王隆基，促為胡軍運糧。下午飛重慶，對「抗日戰史底稿」非常注意，此為在軍令部八年來隨時記述之抗戰實錄。囑軍令部舊屬方防、柯劍震於政府指定地點妥為保存。五日下午飛返廣州，程潛已於三日以長沙降共產黨。六日向李代總統報告此行經過。八日飛臺北向總裁復命，報告西北西南之行情形。關於他不能任蘭州西北指揮所事，對總裁說：「時至今日，國軍尚上下交征利，上下交征怨。所以對於西北指揮所之使命，不願接受。」總裁默默無語。下午偕顧祝同、孫連仲等飛廣州。

冒險勸傅作義效忠

八月十四日李代總統召開之軍事會議，閻錫山、白崇禧、馬步芳、馬鴻逵、胡宗南、蕭毅肅、顧祝同、郭鐵及徐永昌均出席。提到西北指揮所事，閻錫山勉徐永昌赴任，他再申說無必要，他也不能負責。

「這是爲甚麼？」白崇禧視胡馬等，這樣問。胡宗南、馬步芳、馬鴻逵都起立，向徐永昌表示決接受指揮。他也起立，但未即行。馬步芳十八日回蘭州，馬鴻逵十九日飛寧夏，胡宗南二十日回漢中，徐永昌偕秦德純、方克猷二十二日飛重慶，因飛機檢修，又因氣候惡劣，至二十四日起飛時，知總裁已至重慶，往謁研討軍事。二十五日飛漢中，二十七日飛西寧轉寧夏，知傅作義已由北平回綏遠，乃命方克猷飛包頭晤傅。九月一日偕秦方奉命飛重慶。

總裁要他飛包頭晤傅作義，傅亦極欲和他見面。如傅不能歸來，即赴河西張掖一帶視察。因連日氣候不好，飛機不好起飛，一直到十六日始飛至寧夏，已有共產黨代表數人先至。十七日飛包頭，傅作義、鄧寶珊、李世勳、董其武、孫蘭峯等來晤。

徐永昌對傅說：「今年一月間，若聽我所說，即來綏遠，何至在北平受幾個月悶氣。」

「那樣，一萬多幹部如何脫身？」傅似不以徐永昌所說爲然。

「以我個人看法。」傅問徐永昌政府方面對他返綏看法如何，傅返綏時，毛澤東將他存北平之現款、黃金、布匹悉數帶歸。徐永昌說：「青海軍守蘭州，胡宗南在南，馬鴻逵在北，綏遠軍

南下，與寧夏相連，情況緊急，要你回綏遠阻止出擊，……事過境遷，共產黨必對你食言。」

傅搖頭不以爲然。方克猷告知，旅長以上將領，多半已簽名，擁護傅二月間和平主張，正催孫蘭峯等簽名，簽妥即發表宣言。傅問美援情形，並且說：「美國人助我們一分，必宣傳十分，蘇俄幫助中共，總是在暗中努力，現在中共好的砲是俄國的，射手都是俄國人，彼等不但穿中國軍服，而且也不進城。不像美國人須開跳舞會。」

「有無險謀即在此，」徐永昌說：「蔣先生許你以川北爲綏遠根據地，指揮西北各軍，能開川陝邊區固好，即先開河西，也令西北各軍悉受你節制。」傅作義說：「綏軍開不動，我也不能指揮他人。」

「宜生迫我簽字，走避不得。」夜晚孫蘭峯告訴徐永昌：「此時屈從，將來必可對國家發揮力量，祇好允許。」

十九日上午傅作義邀他秘談，傅說：「今日綏遠兵力，攻，形勢不管用，守也力量不够。要走，兩萬眷屬如何安置？況且士兵多爲綏遠人，也難於開動。自己一人南去，既無用，也無聊。即使蔣先生叫我指揮別人軍隊，人家對我無信心，我又何能指揮，所以祇有同共軍聯合，以求生存，經過一段時間，假使受到共軍壓迫時，利用官兵心理，或可打出去。如此做，可能被共黨所殺，但並不希望蔣先生陷雪，權當認錯人，傅某投了敵。最後必將發生一大力量以報答蔣先生，盼望好友來此如此殷切，並不要好友保證，乃是要至少有一人知道傅作義必轟轟烈烈以報國家，

以報蔣先生，不然有死而已。」言畢痛哭。

傅又說：「去年不去南京，決不會有此錯失。當時李德鄰、司徒雷登都說政府必須和平，和也有把握。當時想，既然和有把握，何必西走或南走？此錯失之所由來。」

羣丑包圍大義凜然

徐永昌說：「想不到你走此途徑，中共軍事到某一階段，必對綏軍壓迫清算，還不如此時帶走，總可得兩三萬勁旅以歸政府，以免將來後悔。」鄧寶珊勸他辭職休息，說道：「政府已不可救，何苦摧殘自己。」他則說：「現在政府還向此間送餉，二三日內，此間將領就通電局部和和平，詆譏政府，不怕別人指說麼？」

「政府好壞不計，」徐永昌在羣丑包圍之下，大義凜然，理直氣壯地又說：「我必窮其知，竭其力，以盡其責。」

十九日下午飛寧夏，原打算次日飛酒泉，接總裁電話，還回重慶，報告傅作義及綏遠情形，此時他病很嚴重，神智昏迷。至三十日病情減輕，始飛廣州。十月十三日隨政府遷重慶，十一月二十九日應魏道明邀請，經總裁及閻錫山院長許可，飛港療病。三十日重慶失守，十二月十日總裁由成都飛臺北，徐永昌於十二月七日由香港飛臺北。徐永昌是山西崞縣選出的國大代表，民國四十一年陸大改組，辭校長職改任總統府資政，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卒於臺北，享年七十有三。一生熱愛國家，以久病之體，爲國宣勞，着力忠義。身爲軍人，厭惡殺伐。寧靜澹泊，胸懷壯闊。